

ARTALKS:

藝術跨越疆界，產生溝通力量；談論引動思辯，傳達豐盛訊息

請輸入關鍵字搜尋



2026 年 8 月 13 日（星期四）



《我們正成為 WE Are Becoming》與未定型的「我們」（上）

Author: 吳宜樺

評論的展演: 《我們正成為 WE Are Becoming》

展演地點: 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

展演時間: 2026.5.8 – 2026.8.16

刊登時間: 2026年08月10日 12時05分

最後修訂: 2026年08月12日 16時07分

Share Comments

:: 首頁 / 提名觀察人評論 / 《我們正成為 WE Are Becoming》與未定型的「我們」（上）

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 C-LAB 年度大展《我們正成為 WE Are Becoming》再次向我們展現它的文化格局。這格局的定義不來自量化 KPI 的文化治理——參展作品的數量，或參展藝術家國籍的數量——而是來自策展人吳達坤與郭昭蘭所提出的方法論路線：以「合唱」作為方法，重新編排歷史的聲部，讓曾被忽略或沉寂的藝術作品與影像重新發聲，並明確拒絕將「我們」化約為單一共識，而是透過多聲部矩陣，讓多重地域與歷史時間的經驗成為形塑「我們」的養分。但「格局」的真正判準，或許不在方法論本身，而是在這套方法論能否為自身保留成為別的東西的可能——這一點，須留待下一篇文章檢驗。

《我們正成為》的策展姿態，讓筆者想起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與考古學家大衛·溫格羅（David Wengrow）的合著《萬事揭曉：打破文明演進的神話，開啟自由曙光的全新人類史》（The Dawn of Everything: A New History of Humanity, 2021）。兩位作者調動近數十年的考古與民族誌證據，拆解「狩獵採集—農業—城市—國家」這條被視為必然的社會演化階梯：有些狩獵採集社會建造了紀念性建築並發展出階序，有些早期城市——如烏克蘭的巨型聚落、特奧蒂瓦坎——卻長期維持無王權的自治；某些社會甚至隨季節在階序與平等之間切換政治形態。兩位作者據此提出三種社群生活的基本自由——遷徙的自由、不服從命令的自由、重組社會關係的自由——並追問：我們的社群組織意識是如何被「卡住」（stuck）的？何以這些自由在現代國家體制下變得僵化？何以人們失去了創造與更新現況的想像力？這個問題意識與《我們正成為》的核心命題正好相互呼應。展覽錨定在極為具體的地緣政治座標：日治時期工業研究與冷戰戰略雙重記憶的空總基地、一九七〇年代的全球冷戰情勢與美軍基地在亞洲留下的蹤跡。正是在這個座標上，「三種自由」不再是人類學的普遍命題，而成為可以在作品中逐一指認的歷史經驗。



圖說 | C-LAB年度大展〈我們正成為 WE Are Becoming〉展場圖片 | 攝影：啞嚕影像工作室 | C-LAB 提供



圖說 | 謝德慶〈變化：1969—1973〉展場圖片 | 攝影：啞嚕影像工作室 | C-LAB 提供

第一組作品見證自由如何被剝奪、又如何被偷渡。旅美台裔藝術家謝德慶的《改變：1969–1973》系列作品，記錄他赴美之前在戒嚴時代文化隔絕下孤獨又自由的創作處境，與台灣藝術家陳來興在黨國官僚文化下作為教育工作者的諷刺抒發與社會抵抗相互映照；Jimmy Shy 與張鈺透過亞洲水手刺青，追蹤刻印在身體上的香港流散故事——在帝國與冷戰體制的夾縫中，「重組社會關係的自由」被具體地剝奪，也被具體地走私。許哲瑜與陳琬尹的《加速器》回溯殖民時期的科學基礎設施，指向冷戰地緣政治下的祕密武器研究；何銳安則在新加坡與全球城市、智慧國家的科技神話之間來回辯證，提示治理理性如何在後冷戰語境中換裝續行。

第二組作品是「待命中的聲部」。戰後藝術史曾一度讓某些聲音噤聲：李石樵的《合唱》、彭瑞麟的攝影、藤井光所探討的日本戰爭畫，皆因典範轉移而暫隱其聲。李石樵在太平洋戰爭空襲期間公開的《合唱》，其所隱含的唱誦至今仍處於應該發聲卻尚未發聲的持續待命狀態——這正是格雷伯與溫格羅意義下「未竟之路」的圖像化：被目的論敘事壓抑的聲部，不是歷史的殘渣，而是未能兌現的許諾。劉致宏的《視差》將展場轉化為活性介面，邀請觀者在視線的交錯移動間調校閱讀歷史的方法；區秀詒與陳侑汝則從國家檔案影像中的英雄形象再出發，對歷史與時間的錯置操作展開反思。



圖說 | 李石樵〈合唱〉展場圖片 | 攝影：啍嚕影像工作室 | C-LAB 提供



圖說 | C-LAB年度大展〈我們正成為 WE Are Becoming〉展場圖片 | 攝影：啍嚕影像工作室 | C-LAB 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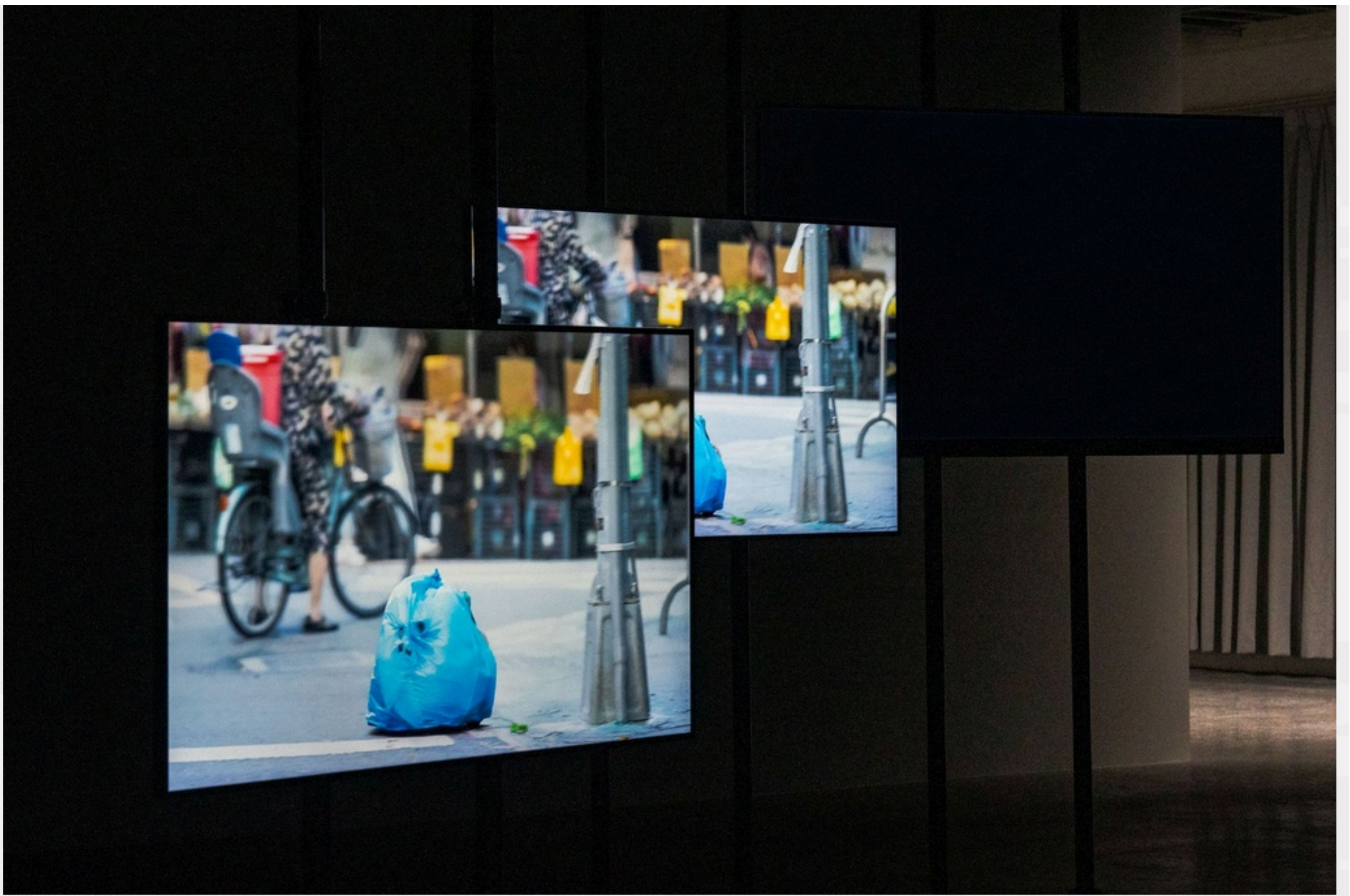
至此可以看出，《我們正成為》與《萬事揭曉》共享著同一個時間哲學：歷史不是朝向現在收斂的漏斗，而是不斷分岔的可能性場域。展覽拒絕把「我們是誰」的答案錨定在某個起源時刻，拒絕「文化主體性」有一個待完成的終點；「Becoming」作為進行式，指向那些永遠在自我實驗、從未定型的文化情境。策展論述所謂「歷史從來都是延遲到來的，它在建築的裂痕與空間的餘韻中悄然流動」，換成格雷伯與溫格羅的語彙即是：歷史是一座充滿未實現可能性的檔案庫，而被壓抑的聲部不是死去的過去，而是待命中的可能性。差別只在檔案的性質——書處理的是考古層，展覽處理的是東亞戰後的藝術與影像。

第三組作品則將「我們」的邊界向外推移，觸探自然與技術的生態危機與移動經驗等議題。徐容的《如何拯救垂死之鳥》以跨物種視角，關注動物在不同地理社會系統中被移動、轉譯與規訓的命運；阮英俊以植物為「活檔案」與社群展開介入合作；Posak Jodian、金令恩（YoungEun KIM）、艾米莉亞·史卡努力特（Emilija ŠKARNULYTĖ）、安娜·特蕾莎·巴博扎（Ana Teresa BARBOZA）的作品，以記譜學的儀式轉譯、神話動物與跨物種感知收束展覽——唯有將「非我們」的事物也編織進合唱矩陣，「我們」才不至於重蹈本質主義的覆轍。

廉仁和（Inhwa YEOM）、江康泉、洪辰煊（HONG Jin-Hwon）、崔廣宇、楊祐丞&彭思錡與阮柏遠的創作，則透過他們所導演的技術媒體共感事件，引領觀眾重新思索一種帶著科技神話幻覺所生成的集體「合唱」——這是展覽提出的另一種異托邦式的社會合唱觀察。



圖說 | 艾米莉亞·史卡努力特〈等質之界〉展場圖片 | 攝影：啞嚕影像工作室 | C-LAB 提供



圖說 | 崔廣宇〈擬態艾利絲行動計劃：未封存之物・艾利絲〉展場圖片 | 攝影：啞嚕影像工作室 | C-LAB 提供

在這裡我們也可以召喚《萬事揭曉》中一個常被忽略的論點：早期的人類社會常透過「分裂生成」（schismogenesis）互相定義——各社會會刻意選擇與鄰人相反的價值，來構成「我們」的自我認同形象。這意味著集體身份從來不是某種內在本質的展現，而是關係性的、對照性的、且可以重新選擇的社會建構；選擇成為誰，從來就是人類社群持續在做、也持續有能力做的事。《我們正成為》把「我們」從名詞改寫為動詞、從遺產改寫為實踐，正是同一個洞見的策展轉譯。

至此，上篇處理的是展覽如何回答「我們是誰」——把答案從起源改寫為分岔、從本質改寫為關係、從名詞改寫為動詞。但這只完成了判準的一半。本文開頭懸置的問題仍未解決：一套宣稱複調生成的方法論，能否為自身保留成為別的東西的可能？「合唱」是這檔展覽最有力的隱喻，也正是它最需要面對詰問的位置——合唱需要總譜、需要指揮，而策展本身，難道不正是一種總譜的書寫？當「成為」被文化部轄下的機構承接為年度大展，becoming 的反建制脈動與「基礎設施」的建制語法之間，存在著尚未言明的張力。下篇將循此檢驗：這檔展覽是否把自己，也編進了它所指揮的合唱。